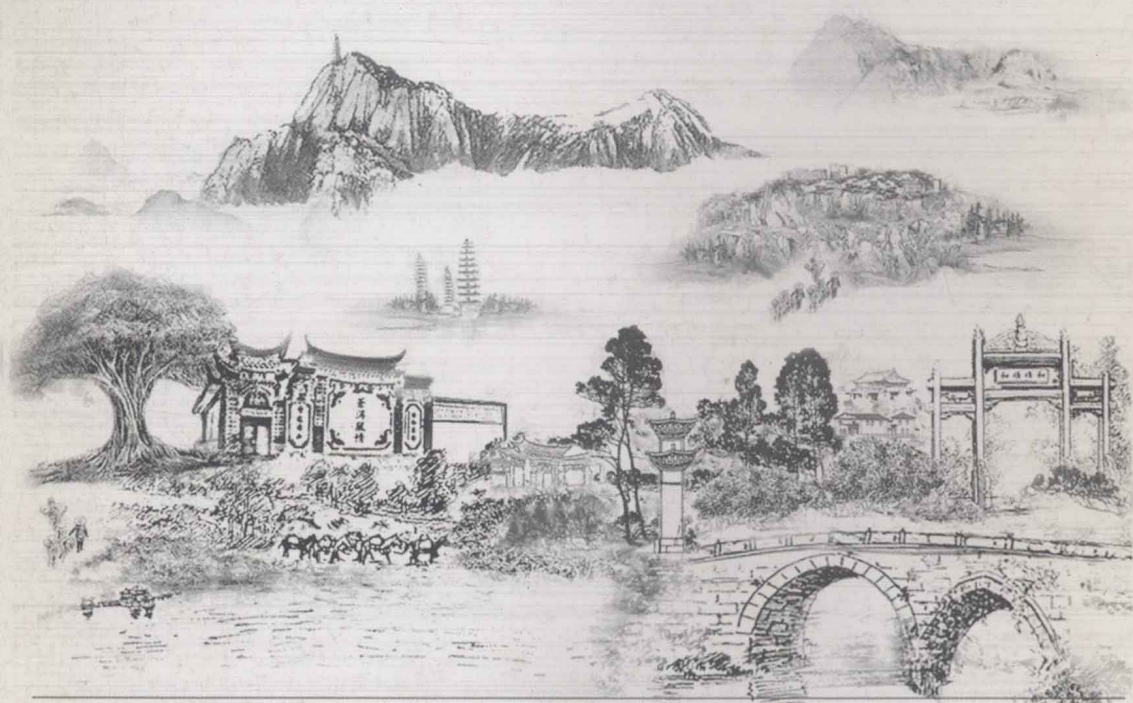


# 云南侨乡文化 研讨会文集



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编  
2005.12

# 云南侨乡文化研讨会文集

## 目 录

1. 代序言.....李祖沛 1
2. 导语：全球化视野下的侨乡文化研究与解读.....李巨涛 2
3. 关于中国陆疆侨乡研究的若干思考.....何作庆 范文昌 彭 强 11
4. 浅析云南侨乡文化成因、特征及建设.....高泽涛 18
5. 浅析云南侨乡儒商文化.....何良泽 23
6. 从腾冲侨乡历史看侨乡文化的构成、内涵及特征.....马守昌 27
7. 腾冲侨乡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董 平 33
8. 侨乡喜洲文化概述.....施立卓 40
9. 大雅和顺——来自一个古典聚落的报告.....季富政 46
10. 盈江昔马侨乡的马帮文化.....李祖品 51
11. 侨乡和顺与喜洲文化底蕴的观察.....吴 棠 58
12. 从照壁题字剖析喜洲侨乡民居建筑文化.....田怀清 63
13. 龙陵侨乡文化浅议.....何德尊 68
14. 保护挖掘侨乡文化、丰富云南文化内涵.....保山市侨联 71
- X15. 阅读喜洲.....赵 勤 76
16. 侨乡喜洲的特色文化.....施珍华 79
17. 浅谈红河县侨乡文化产业的开发.....张尧邦 82
18. 喜洲白族商帮的形成及其文化遗产保护.....杨育新 张锡禄 87
19. 打造侨乡品牌文化 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思茅市侨联 93
20. 打造侨乡文化大有可为.....沙必璐 96
21. 象达侨乡文化源远流长.....象达乡党委、人民政府 99
22. 试论和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和顺镇人民政府 104
23. 再创茶马古道辉煌.....鹤庆县侨联 108

|                                 |             |
|---------------------------------|-------------|
| 24. 李根源与和顺·····                 | 杨发熹 113     |
| 25. 和顺百年发展启示·····               | 卞善斌 120     |
| 26. 八大词堂 文化渊薮·····              | 杨发恩 124     |
| 27. 和顺文化的摇篮——文昌宫与图书馆·····       | 张孝仲 128     |
| 28. 独具魅力的和顺侨乡·····              | 王益群 133     |
| 29. 和顺群体文化——《和顺闻抄》后叙·····       | 杨发恩 139     |
| 30. 挖掘回族侨乡文化 为巍山经济建设做贡献·····    | 左红珠 144     |
| 31. 和顺居民建筑艺术·····               | 杨达杰 147     |
| 32. 《和顺乡》侨刊新坐标·····             | 和顺镇人民政府 149 |
| 33. 一幅侨乡的社会风俗画卷——《阳温墩小引》解读····· | 杨发恩 151     |
| 34. 近年喜洲文化研究清单·····             | 朱家风 158     |
| 35. 和顺的水和顺的山·····               | 杨 滔 160     |
| 36. 喜洲之光·····                   | 刘傅森 163     |
| 37. 华侨与和顺书馆·····                | 陈坤华 168     |
| 38. 侨乡行——苍洱饮食文化走笔(三篇)·····      | 涛声 依旧 170   |
| 39. 喜洲商帮的形成和作用·····             | 赵 勤 174     |
| 40. 当代中国侨乡系列片《彩云之乡——云南》解说词····· | 李巨涛 杨兴仁 186 |
| 41. 民族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            | 曾少聪 193     |
| 42. 当代中国的华人华侨研究·····            | 贺圣达 205     |
| 43. 后 记·····                    | 213         |

# 代序言

中国侨联副主席 李祖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追寻并守望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侨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强大思想动力。

侨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侨乡社会演变、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记录了随着华侨的出现，近现代侨乡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记录了海外侨胞对祖国、对家乡的拳拳之心，它折射的是海外侨胞对家乡的眷恋，对家乡的深情期盼，以及海外侨胞在各个历史时期与家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爱国爱乡精神，闪耀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光辉。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顺乡图书馆，就是云南侨乡文化中的奇葩。研究侨乡文化，传承文化，启迪当代，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侨乡、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精神财富，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民族振兴、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云南省侨联在今年中国侨联文化交流年的主题活动中，精心举办此次研讨会，探讨和研究侨乡文化，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侨乡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将带动各界对侨乡文化的再认识。本次研讨会倡导借助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侨务政策、华侨历史等研究侨乡文化，整合社会资源，将进一步推动侨乡文化和侨联工作的新发展。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民族文化绚丽灿烂，云南又是全国重点侨乡，海外侨胞众多，独特的侨乡文化成为云南民族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云南侨乡文化孕育的地方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将云南人民与海外侨胞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传承文化，珍爱和平，致力发展，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和研究侨乡文化，将有利于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云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促进云南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为构建和谐云南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侨联是我们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桥梁和纽带，党和政府对新时期侨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弘扬中华文化是新时期侨联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开展有侨特色的文化活动，努力挖掘侨乡文化资源，丰富侨乡、侨史研究，让侨乡文化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 导 论

### ——全球化视野下的侨乡文化研究与解读

李巨涛

#### 一、概 说

##### (一) 问题提出与概念建构

党的十六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鉴于文化的这种力量和作用的深刻认识，我们提出了以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侨情，拓宽并深化对海内外侨情的再认识。

首先，本文中“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总积淀。其次，中华传统文化是生成于中国本土、经东西南北中各种文化相互撞击、相互渗透、融合后，又不断吸收、融汇和涵化了各种外来文化，逐渐形成的以儒家为主导、儒道佛互补的文化构架和体系。再次，中华“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殊分支，它包括了本土侨乡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两个支系。其中，华人文化是海外华人华侨在海外特定环境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本，同时吸收域外文化的合理成份，以适应在侨居地生存、共处和发展需要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包括了华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生活习俗等。而侨乡文化则是华侨、归侨以及侨乡人民，在长期经济、文化、人员方面的交往与互动，在以经济为基础、文化为动力，在备加推崇和大力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适当吸纳了域外文化某些特点而结出的果实。

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华“侨”文化研究中，华人文化研究（主要是地域性华人文化研究），初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到九十年代后，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华人文化研究才略成形态；而本土侨乡文化研究，在国内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总体而言，中华“侨”文化研究，目前仍处于弱位。因此，无论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知识体系和方法论方面，中华“侨”文化研究至今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系统。目前，在既缺乏范例作参照与借鉴，又于知识与方法方面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斗胆以一省之侨乡文化为切入点，强调以多学科手段对其开展全方位研究，本身就具有挑战自我的意味。科学无坦途，科学探索更要有勇气，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的真实状况和心态。

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当今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我们对侨乡文化的研究，无疑是在“全球化”背景与“和平发展”的语境下提出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目的性。是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广泛团结侨胞、不断增加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也是弘扬中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它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深化侨情认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推进侨联事业的向前发展至关重要。据此，我们对我省侨情及侨乡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

粗浅认识和思考，以期抛砖引玉，引出各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真知灼见和高才宏论，全面促进包括侨乡文化研究在内的中国“侨”文化的学科建设。

## （二）“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研究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科技一直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人们同时发现，伴随着经济、科技交往，有一个随影而行、不期而至的“幽灵”——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志。真正“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流与山脉的语言”（雅克布·格林）。文化，又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志，它还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它称之为“国家软实力”。西方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从来就把文化视为关乎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战略课题，把它摆在与经济、科技、军事等量齐观的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障国民生存所必需的食品消费指数——恩格尔系数已平均降至0.5以下（城市则在0.4左右），因此，当国民生活水平初步达到小康后，必然要对精神文化及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当人们还没来得及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回应时，外来文化的强势渗入已成事实。由此，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对民族特性的坚守与护佑、对先进文化的探索与建设、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取舍，和对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审视与应对，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世纪课题。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科技迅猛发展，人、财、物及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更加便捷和频密，世界上的一些固有矛盾和差距，迅速浮显并扩大。国际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的桎梏。交流、汇合、冲突、竞争、振荡……世界仿佛进入了新的“战国时代”。从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立场出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外观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及其走向，作出了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的判断。不久后，他又在一部名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著作中，把观察“文明的冲突”的视角转向了美国本土，它内视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种种挑战，提出美国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我们姑且不去评判亨氏书中的是是非非，从他观察问题的大视野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即：中华民族要在本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就不能只重视经济建设，而不重视文化建设。因为，一个文化上散乱、迷失和脆弱的国家或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备受世人尊敬的民族。因此，当我们把文化与国家安全、民族特性、文化传统、改革转型、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精神文明、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进行关联性思考时，就不能不把它置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亨廷顿语）下加以研判，而不是就“侨务”说“侨务”，就“文化”论“文化”了。

## （三）从侨乡文化切入重新解读侨情

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侨联工作是这一战略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的侨务及侨联工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舞台上，活力四射，影响广泛，成效显著。

纵观中国近代至当代史，从民主革命推翻帝制，到抗日战争救亡图存；从新中国的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从终结“文革”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每当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海外侨胞始终以民族、社稷为重，总是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样，海外侨胞离乡背井，孤悬海外，备尝凌辱，仍能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都能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一语中的的，他说“纵观世界华侨华人的成功，其起作用的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和力量源泉。因此，海内外中华儿女固有的民族情结和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是侨务及侨联工作赖以维系的根本。一旦切断了这种“人缘”和“文缘”，侨务活动就无所依靠。因此，通过对中华“侨”文化（海外华人文化和本土侨乡文化）的研究，全面分析、解读并把握侨情，或通过对侨情的把握与研究，深刻了解中华“侨”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下演变和发展情况，这对于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确保侨务及侨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世情、国情、社情、侨情都在发生变化。作为侨联工作者，我们对海内外侨情的认识和把握，已不能适应和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继续满足于用简单化、概念化、格式化的侨务话语，几近刻板的政策语汇和言之无物的“侨情介绍”来搪塞公务，那无疑成为我们思维僵化、认知贫乏、缺乏进取心的标志了。因此，以文化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侨情、认识侨情，拓宽和深化侨情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后侨情调研的一条新的途径，这也是我们举办“云南侨乡文化专题研讨会”的一个动因。通过对侨乡文化的研究，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至远、从内到外的认识路线，全面推动对中华“侨”文化的研究，进而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华“侨”文化研究系统，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 二、云南海外移民动因与侨乡文化特点

### （一）云南海外移民的历史动因

中华民族是在危难和危机中走向世界的。总体而言，我国古代移民主要是由内地到沿海、由北方向南方，再由东南沿海走向南洋（东南亚），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指出，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他说，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或是“发迹了”。近代中国海外移民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情形，西方是在国力强盛后，政府出于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有计划地向海外殖民。而在中国则相反，是因为由于国势衰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抛下“安土重迁”的传统，背井离乡，漂流到海外。这种来自民间的自发的海外移民，主要以宗族乡土关系为牵引，形成一条人邀人、家带家，父子相引、兄弟相帮、子孙相传、同乡相携的移民链，因此，它具有浓厚了家族和地域色彩。

除以上共性外，云南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在向海外移民过程中，存在有别于内地或沿海的一些特殊形态。云南位于世界屋脊向中南半岛过渡的中间梯级，与中南半岛广大地区，“山同缘，江同源”，地处东亚大陆与中南半岛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汇的十字路口，云南在历史上移民发生早，持续时间长，民族种类多，移民形态多

样。历史上，云南这块高原厚土，曾慷慨地接纳过许多逐水草而至北方古代民族；初农阶段，当地土著又习惯于刀耕火种，轮耕游耕，在有疆无界的环境里，一迁再迁；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又因国力衰微，政治动荡，兵起匪乱，加上灾害频发，工商破产，农民失地，百姓因生活无着而被迫外迁。其中，社会变故引起的恐慌和资源匮乏与人口增长的矛盾，是向外移民的根本原因。质而言之，灾祸和贫困是云南人向海外移民的直接原因。

## （二）特殊自然与人文环境下的云南侨情

云南跬步是山，鲜有舟楫之利，民间有“不怕三山阻，只怕一水隔”的说法。自古省内交通以步道和驿道为主，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初，因此对交通方式的选择没有条件提出更多要求。云南人祖祖辈辈或以步当车，或靠人力（乘轿）或畜力（骡马运输）为代步工具。他们初到海外谋生，或进山开矿、或上山伐林、或替人跑腿赶骡吆马、或到僻壤开荒种地、或走村串寨贩卖杂货、兼收山货、或受雇打杂……总之，多数人靠出卖劳力和从事小本经营以维生计。其中，也有少数出类拔萃者，因博学多才，手勤脑活，人缘广泛，经营有方，经商而富，兴业而强；也有凭命（命运）打财，偶获巨宝（采到上好玉石或宝石）一夜暴富者，等等，不一而足。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是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重视伦理，安土重迁。侨乡人外出谋求生计，仍遵循天时，春播秋收，农闲出门，农忙归家。天长日久，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谋生之道后，才由流动转为定居，其情形与当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几近相似。由于传统习惯加上地接土连，云南海外乡亲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婚姻等方面，与家乡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不同的是，过海移民因有天然屏障，往返极其不易，多数人一开始就选择了定居；又因“背水一战”，无退路可言，反能成团抱伙，顽强拼搏，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相比之下，云南海外移民，乐于在与云南自然与人文环境相仿的地方落脚，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越南和老挝北部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就成了云南籍人士的主要落脚之地。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消费均不算高，初到新地者能较快适应环境，易于谋生。这种近乎“温室”的生存环境，使小农经济意识没有得到彻底的荡涤和改造，所以，多数云南人在经营范围、从业领域以及生活方式方面仍较为传统，这些情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云南人向海外移民除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压力，同时，侨汇也为家乡亲人改善生活、发展生产提供了帮助，而且还成为当地外汇的主要来源。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讲，移民的迁入，带来了新的劳力、新的生产技能、新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增强了两地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

云南地处边地，距中原较远，且无现代交通可以直达，许多较有实力的商号，根据市场供求关系，以本地为中心，在内地设供销点，到海外设分号。云南众多商帮几乎都是围在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区，如：云南、四川、西藏、缅甸、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商贸。这些跨境、跨国经营者，长途跋涉，不畏艰险，依人力蓄力，终年累月地把本地茶叶、盐巴、药材、皮货和进口的棉纱、布匹、纸张和日用百货，如蚂蚁搬泰山般，运进输出。只有走出大山后，才有条件换乘汽车、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转输到销售地。这是一座以人脚与马足架起的、联接云南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伟大桥梁。回眸历史，其场面壮观如史诗。由此，在云南众多侨乡出现了以跨国、跨

地区经营而闻名的大商帮。如：腾冲帮、喜洲帮、鹤庆帮、龙陵帮等，此外还有虽未称“帮”，但实力、规模及成就均表现不俗的中甸、丽江、巍山、迤萨等地商队。

还须说明的是，云南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由于地理上的亲缘关系，也带来了文化和民族的亲缘性。由于一族同源不同国度，边境一线世居土著统称“边民”，双方相互往来较为自由，但，基本上不具有侨的要素及特征。此类情形遍及德宏、思茅、临沧、版纳、红河、保山、怒江等州市边境一线。迪庆藏族自治州海外藏胞，他们是一个较特殊的群体，有专部门负责其工作。另外，中缅划界后划归缅甸的果敢地区果敢族（属汉族），他们与临沧镇康、永德等地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均不属本文所涉及的话题。

### （三）云南侨乡地理分布及民族多样性

历史上云南向海外移民，基本上是由北向南，帚型散开。所选择路线多为古代“西南古丝绸之路”和“盐茶骡马古道”的干线及其支线。因此，在古道两翼形成了众多的侨乡。如，沿滇缅公路滇西方向有：昆明、楚雄、大理、祥云、巍山、施甸、隆阳、腾冲、梁河、龙陵、畹町、瑞丽、陇川以及盈江等；沿滇越铁路滇南方向有：玉溪、通海、峨山、个旧、开远、建水、石屏、蒙自、河口等；沿滇藏公路滇西北方向有：鹤庆、丽江、维西、香格里拉、德庆以及贡山等；其它滇南、滇东南、滇西南方向各支线上还有：凤庆、永德、镇康、耿马、新平、墨江、镇远、红河、文山、马关、砚山、麻栗坡、勐海、勐腊等侨乡县区（部分参见云南省人大侨委编《云南对外开放和侨务及侨务立法初探》“云南省侨情概述”）。

云南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由此，也决定了云南侨乡的民族多样性。如：腾冲的和顺乡为汉族侨乡，大理的喜洲镇为白族侨乡，红河的迤萨镇为哈尼族、彝族、傣族侨乡，盈江的昔马乡为汉族、景颇族侨乡，个旧的沙甸、通海的纳家营、峨山文明和巍山的永建镇等为回族聚集的侨乡，等等。

此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家在云南省的九个县设立了十三个华侨农（林）场，在那里先后安置了四万多名因排华回国定居的归、难侨。他们分别来自印尼、印度、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省籍，且经济条件各异、生活习惯不同，所受教育和从事职业以及社会背景均大为不一样的归侨群体，一下子聚集在远离都市的农村，从事单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不能不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现实。再加上他们既能讲不同侨居地语言，又能讲不同省籍的方言，还有不同侨居国的文化影响……因此，华侨农场这一归侨侨眷聚集的农村社区（队），呈现为另一类文化风貌。后来，由于许多归侨不能适应农场艰苦生活，又先后或移居海外、或到其它城镇定居。在这十几、二十年间，这些华侨农场出现了新老交替的情况。在迁进或迁出中，在侨场留下了不同特色的文化堆积层。

综上所述，云南之“侨”有以下几个特点：地理上，云南侨乡属内陆边疆型；时间上，“侨”之形成，与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移民迁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民族成分上，它几乎涵盖了云南省26个世居民族；文化方面，它仍是中华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即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本土与域外文化相互吸纳、交融；侨居地选择上，主要集中在与我省毗邻的周边国家；经济活动方面，经营项目较传统，规模不太大，管理模式以家庭化或家族化为主；作为新侨乡的华侨农场所在地，在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方面，

因不同时期、不同因素的加入，形成流动、整合、融合、沉淀，再流动、再整合的形态。

### 三、以多学科手段开展侨乡文化研究

#### （一）侨乡文化的内涵

有关文化，在本土较大影响的说法，有梁漱溟先生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了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大内容；有蔡元培先生“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它涵盖了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梁启超先生“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它包括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农事等等几种不同的表述。在西方较流行的说法有：文化是人类实践和信仰的积累；是一种信仰的模式，它铸就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性格；是一种思想和实践的系统；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构，它产生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在社会交往中起作用的共同的信号，以及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体系等等。

以上各说，均说明文化概念的宽泛性、包容性和指向性。以此类推，就可以把侨乡文化概括为：华侨、归侨及侨乡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它既表现在器物层面，也表现在人们的精神层面。省侨联在“关于建立云南侨乡文化示范基地通知”中曾指出：“侨乡文化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其最主要的特点是，体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鲜明的爱国爱乡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创新与发展。”当然，这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侨乡文化应该包括侨乡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社会结构、组织形态、政治统属、亲属关系、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审美情趣、理想人格、宗教信仰、祖先祭祀、乡规村约、诚信意识、契约方式、法律法规、公共事务、人际交往、海外关系、教育模式、公益事业、生产生活、经济活动、交通方式、通信联络、民风民俗、节事活动、方言口音、山歌民曲、传统技艺、饮食习惯、自然改造、环境保护、社区规划、建筑样式、议事制度、文献史籍、文学艺术、社会舆论……等等。它涉及到侨乡人民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海内与海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方方面面，是一个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的大文化观。

#### （二）侨乡文化研究方法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首先要解决好科学观和方法论问题。同时，要以科学之精神和手段研究侨乡文化，就必须借助各种现代学科手段来进行研究。

目前，海外华人文化及华人族群研究，在海内外学者中已有一定说法和做法。曾少聪博士根据海外华人在侨居地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属性，提出从历史学以外的其它学科、尤其是运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华侨华人问题的主张。民族学海外华人研究，主要围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心课题是海外华人的亲属关系、社会组织、文化的变迁与同化、族群关系、移民与网络等。本土侨乡文化方面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东、福建和广西主要侨乡省（区）的一些专家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开展了研究，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并对区域性、地方性的侨乡文化开展了专题研究。云南侨乡文化研究，目前尚局限于描述性和记录性的层面，局限于史和

志的层面。

侨乡文化属于历史范畴，它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孕育、积淀后在本土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侨乡之所以成为侨乡的“海外关系”链断开了。不过，在历史的文化视野下，过去三、四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只不过是历史的瞬间。因此，侨乡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形态，仍然是可感可知可见可触的对象，它不仅有学术上的研究价值，而且由于处在各学科的边缘与交叉地带，众多学科都可以在这里施展其才，并有所建树。”

在侨乡文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要合乎中国绝大多数侨乡的历史和现状，合于国情和侨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绝大多数侨乡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乡土社会性质（虽然目前许多乡镇以走城镇化改造的轨道，乡土性正在迅速消退）。除了乡土性外，侨乡文化研究尚处于非主流的研究领域，同时，侨乡文化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异性，因此，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比较贴近它的实际。我们的这一主张与是云南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和红流中心的学者不谋而合，他们以县校合作的模式正式启动了“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课题研究”，该项目获得了省级社科基金的资助，我们期待着它为我们开展侨乡文化研究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

文化是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文化人类学创立于 19 世纪中期的西方，20 世纪初传入中国。文化人类学为人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该学科在美国称“文化人类学”，在英国则是“社会人类学”，西欧和中国一般称“民族学”。著名文化人类学者童恩正认为，事实上，某些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和自然科学（如解剖学、生理学）也都是以研究人体或人类的社会行为作为目的的，但是人类学家与这些科学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研究不是对个别知识的局部了解，而是从总的方面确定人类的性质。人类学探讨着人类行为的规律，并且在人类生物史和社会中发现这些规律。他强调，“文化人类学侧重于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藉此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文化人类学在方法上有多种学派，如：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法、整体方法、功能方法、主位研究法、客位研究法等等。现在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围已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科分支很多，并进入应用领域（参见童恩正学术文集《人类与文化》）。

在指导文化人类学调查的具体实践方面，汪宁生教授在其专著《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中，对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案和调查提纲的拟定，调查前的案头准备工作，调查队伍的组建，装备的配备，地点的选择和调查和观察对象的物色，当地语言的学习，参与观察，走访调查、抽样和随机调查的运用，材料的记录与核实，实物标本的搜集、成果的整理、公布及存档等环节，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一个中国化了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

侨乡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继承性和逻辑性，亦有客观的规律性，如何认识和遵循侨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或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综合分析、提炼概括，推介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侨乡优秀文化传统，培养民族精神，是摆在侨界和文史学术界人士面前的重要课题。

### （三）侨乡文化研究队伍的建设

以侨乡文化为切入点，以学科方法为手段，努力拓宽并深化对侨情的再认识，这既是侨联组织队伍的优势，同时又是我们的劣势。侨联工作者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对侨情较有了解，在感性和理性上对“侨”都有所认同和认知，再加上侨联基层组织覆盖广，人头熟，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我们缺乏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侨乡文化研究涉及到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组织学、文化学、经济学、文学、国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知识，侨联干部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严重不足是个突出的问题。因此，建设一支学习型组织就尤为显重要和紧迫。为了缓解和改善上述情况，我们主张走一条专家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上级组织与重点侨乡基层组织相结合，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与地方政府和涉侨部门结合，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相结合，多种学科相结合，传统纸笔听录手段与现代影像录音手段相结合，文献考据与实物考证相结合等多种模式，充分调动并整合社会资源，走一条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独具特色研究之路。

在此，我们还特别推荐有条件的地方，采用影视人类学手段开展侨乡文化研究。影视人类学被定义为：“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见庄孔韶《文化与性灵》）。影视人类学的载体：照片、电影胶片、录像磁带、数字照相（录像）机—电脑构成的多媒体表现系统。

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着眼未来，面向世界，树立侨联工作的文化意识，增强文化思维能力，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提升侨联组织能力建设需要，更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我们整体“软实力”的需要。目前，我们要审时度势，着眼当前，努力抓紧抢救一批活的历史资料。通过笔记、录音、影像、实物、图片、文献等各种介质记录历史、反映现实。要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组织编写“五史”那样，提倡采写个人、家庭、家族、族群、社团、企业以及各类实体的成长史、奋斗史、发展史、兴衰史、经营史、苦难史、参政史等等。要吸引媒体及文化专业人士，参与采写海外华侨华人、国内归侨侨眷中上至著名侨领、实业家、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等，下至平民百姓和普通人的传记和故事。只有广泛的挖掘，我们才能从中提炼出中华“侨”文化之精华。这些方面侨联工作者要做好服务，提供线索、提供方便，有能力和兴趣的也可以亲自“操刀下厨”，做到不拘一格。

### 四、结束语

侨乡文化研究总是和移民现象联系在一起。侨乡文化研究自然要延伸到海外华人文化研究。因此，世界各国对移民问题关注程度及其走势，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近30多个国家开展了针对海外侨民的专项工作。其中通过组织科研力量对侨民的历史与现状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设立专门机构、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立法和政策层面维护权益成为各国争取海外移民支持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通过举行世界性移民代表会议，加强移民与母国的联系，增强海外移民的向心力和归属感，通过外籍议员会议，开展院外活动，维护祖籍国利益，争取侨汇、吸引侨

资侨智，大力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等是普遍采用的措施。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的美国，对待移民问题已不象过去那么宽容大度了，我们可以从亨廷顿著作《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一书中，找到这样的一些耐人寻味的話。他说，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就使得文化作为国家特性源泉变得更重要了。双重身份、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的人多了，同一国出来的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形成跨国的同文化移民社群。但如今的移民能够更方便地与原籍国的人们保持联系和交往，他们以国外聚在一起，更容易抱成一团。原籍国的政府现在也把这样的移民社会群看作是一种财政以及其他支持的来源，还可以利用他们对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政府施加影响，因此也乐于促进国外的移民社群的扩展、动员和体制化。”由此可见，为了保持美国国家特性，一些美国学者对外来移民文化以及与祖籍国的联系已有所警觉。它提醒我们，在开展海外华人文化和本土侨乡文化时，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是不可取的，应该以积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不要为满足自己的“口福”和迎合别人的“耳福”，而授人以柄。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交往、包括移民活动，客观上是人类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共同创造新的文明的伟大过程。我们也要以“他者”的眼光分析和解读这一历史现象，才是包括海外华人文化和本土侨乡文化研究的正途。

历史在前进，经济在发展，人们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也在深刻变化。工业化社会正在受到日益发展的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影响和冲击，以至一些学者称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知识时代”、“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但在信息和新的知识作用日益增长的同时，各民族传统的文化和工业时代的文化，仍在影响人类，同信息时代的文化发生复杂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都变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更为开放、更为互相影响，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显得更为重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宏观层面文化已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在微观层面，产品的生产不能不考虑文化的因素，产品的价值在不同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中的文化含量；在中观层面，文化已成为影响甚至决定经营管理水平和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文化时代已逼近我们。在新的文化背景和激烈的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我们研究侨乡文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工作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做出贡献。

# 关于中国陆疆侨乡研究的若干思考

## ——以云南红河县(迤萨镇)侨乡研究为例

何作庆 范元昌 彭强

**摘要:** 本文从中国陆、海疆侨乡文化分类研究视角出发,以云南红河县(迤萨镇)侨乡研究为例,探讨了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中的方法选择、组织保证、经费筹措、研究者的使命与基本素养等,指出了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海疆侨乡文化 研究方式方法 探讨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如何评价国家综合实力?成为摆在各国人们面前的一个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经过讨论,由单纯重视国家物质硬实力向高度重视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即物质、武装等>和软实力<即文化和人脉等>)的转变,成为世界各国人们的共识。我国在境外的华人华侨无疑是一支具有软实力(即具有中国文化和人脉等力量),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软实力之一。为此,笔者有志于从研究方式方法对中国陆疆侨乡文化作一探讨。

### 关于研究视角的选择——中国陆、海疆侨乡文化分类中的陆疆侨乡文化研究

过去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中国海疆侨乡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而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却是薄弱环节。研究不足,成果不多。陆疆侨乡文化研究是中国陆、海疆侨乡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据庄国土编《华人华侨研究中文书目·侨乡》([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年)统计,过去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中国华人华侨研究是在概论、华侨志、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历史、人物传等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华侨志方面较为突出,如福建的《泉州华侨志》、《漳州华侨志》、《晋江华侨志》、《南安华侨志》、《惠安华侨志》、《同安华侨志》等十二本或套,广东的《汕头华侨志》、《佛山市华侨志》、《惠州华侨志》、《茂名华侨志》、《惠阳华侨志》、《梅州华侨志》等十五本或套,其它省(区)的较少;在侨乡文化研究方面,以庄国土编《中国侨乡研究》为概论类唯一的代表,其它大部分以福建、广东两省为主的专题性关于中国海疆华人华侨研究的书籍,涉及内陆省份的仅仅有《江西侨联志》等极少部分书籍,而作为中国省(区)级侨联六大组织之一的西部内陆唯一的云南省仅仅有毕坚著的《侨乡传奇》、董平著的《和顺风雨六百年:云南著名侨乡》等几本书籍公开出版发行,可见,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是侨乡文化研究中真正的薄弱环节,研究不足,成果不多

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是中国(云南)陆疆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是中国(云南)陆疆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主要体现在:(1)侨居国外的华人华侨人数众多。2005年8月据红河县侨联统计,红河(迤萨)作为云南滇南的侨乡中心之一,现今1万6千多人的小镇,侨眷占总人口的70%,有3000多人侨

居国外；(2)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华侨共同参与的“多元一体”华人华侨是迤萨侨乡的特点。据《红河县华人华侨及其眷属人口登记表》中就民族成份情况看，据统计迤萨镇汉族华侨有 175 户，占华侨总人口比例的 54.34%，少数民族华侨 136 户，占华侨总人口比例的 45.66%；(3)侨居国家众多，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是红河华侨的特点。侨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老挝，其次是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还有一部份侨居在欧美国家及港澳台地区；(4)华侨大多是陆疆走马帮出境的，华侨少数人富有，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一般，属于“苦侨”；如今迤萨走马帮出过国尚健在的人仅有 7 位在世，而且均年岁已高，在走访的马帮老人中最年长的——高寿荣 94 岁，较年青的宋山(80 岁)。

### 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已具备了展开研究的各种基本条件

2003 年底至 2004 年初，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课题的经过红河学院人文学院的酝酿，以何作庆、朱明为代表的一批曾在红河县生活过或工作过的教师，在红河学院重视科研的大环境下，在家乡父老、亲朋好友的期待目光中，决心为为地方民族做一点实在的事情的愿望，通过与校领导的多次交流、沟通，取得了红河学院领导对课题的意义的理解、赞同和支持，2004 年下半年红河学院院长彭兵给予了校长基金支持 230000 元的课题前期启动经费的支持，成为校内文科立项资助力度最大的课题之一，已是人文学院与红流中心首次合作的科研课题之一；同时，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课题在 2004 年上半年通过多渠道与红河州侨联、红河县政府的多交流、沟通，使红河县委政府领导对红河侨乡文化研究课题的意义加深了理解和赞同，最后，终于各方达成了共识，红河学院(委托人文学院与红流中心)与红河州侨联、红河县政府签订横向联合协议书，校县合作研究的模式最终形成。

2005 年初，经红河学院“红河侨乡文化研究”课题负责人认真填写云南省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申请书，加强与科技处的配合，向云南省社科规划办的积极申报，该课题已被立项，成为红河学院第一项获得省级社科基金项目，也是校县合作申报科研课题的成功模式。

### 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以文化人类学为主的综合方法研究中国陆疆侨乡文化

当研究的方向——“红河侨乡文化研究”课题以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经过比较后，课题组选择了以文化人类学为主的综合研究方法。

### 以文化人类学为统率的多学科研究红河侨乡文化方法的选择

按照 R·M·基辛著《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的理论，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红河县侨乡文化研究上，其对象主要是传统侨乡社会遗存的“活的有机体”，即红河传统侨乡人们的文化、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行为和文化的科学性通则。例如直接考察现存的红河侨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助于了解现存侨乡人们过去的婚俗、葬仪、家庭结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生活环境、语言、文字、经济与交换关系等。文化人类学的特点和优越性在于，可以同时将人类视为生物机体和文化产物，视为文化性和生物性的互补和互助，同时从生态系统和社会体系来看人类，因此可以对人类状况的演化提出广泛的透视，尤其是直接通过实地调查、观察、研究现存的红

河侨乡人们的遗存的“活的有机体”去认识过去红河侨乡传统社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侨乡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文化人类学为统率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统率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对当代西部云南省红河侨乡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的任何研究都要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另一方面表现为实地调查中，要辅助以社会学、民族学的方法为主，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方法。

### 关于文献查阅法、理论研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的辅助运用

对当代西部云南省红河侨乡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的任何研究，即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而要完成本课题的目标，就必须应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云南省红河侨乡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为个案进行全面的调查，同时对红河侨乡马帮商队与国外的各个民族进行跨国的重点调查。目前，红河学院与红河州侨联和红河县人民政府分别签订了《关于双方共同开展红河侨乡文化研究的协议书》，奠定了理论研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的辅助运用的基础，2005年8月，课题组一行十人运用此方法在红河县迤萨镇侨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

### 比较研究的方法

这种方法将贯穿于东南亚各国华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和凝结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应用于各国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相处相融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要运用其它的方法。

### 关于研究组织的保证——以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整合区域内的研究力量

当红河侨乡文化研究的视角、方法确定以后，科研课题研究的组织保证就是决定的因素。本课题组主要采取了下列的几点来实现组织保证的：

### 以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为研究中坚力量

为了确保科研课题研究的组织保证的实现，课题组组成以红河学院红河流域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人文学院教师为主的科研中坚队伍。首批参加第一阶段调研的十人教师中，他们是红流中心的何作庆、许敏、屈燕林，中文系的朱明、卢鹏、陈建军、毕明良、黄明生，理学院的袁寒，商学院的王剑芳等，从职称结构来看，副教授以上职称为四人，占40%，讲师和教员六人，占60%；从学历结构来看，具有硕士学位的人为六人，占60%，其余四人为学士，占40%。从而保证了以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为研究中坚目标的实现。

### 以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为科研课题的领导核心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是当地的权威领导机构，具备在当地对各单位及其它组织的人、财、物等的综合协调能力。课题组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坚持以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为科研课题的领导核心，经红河县政府、红河州侨联、红河学院三家单位充分协商，决定成立“红河县侨乡文化课题研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以红河县委政府“两办”名义下发了“红河县委办公室2005年66号文件”，组成了以窦云涛(红河县委书记)、

李期博(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前所长)为顾问,以马文亮(红河县人民政府县长)为领导小组组长,以张春(红河县委副书记)、何作庆(红河学院红流中心副主任)、沈俊伟(红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常务副组长,以张俊伟(红河州侨联党组书记、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李艾频(红河州侨联副主任)、张红元(红河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朱明(红河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为副组长,谭泓(红河州外事侨务办办公室巡视员、侨务科科长)、张尧邦(红河县侨联主席)、祝金荣(红河县侨办副科长)、钱文虎(红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为领导小组组员。

同时,为保证“红河县侨乡文化课题研究”在迤萨镇顺利展开,以张春(红河县委副书记)、何作庆(红河学院红流中心副主任)、沈俊伟(红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课题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一行亲自到迤萨镇指导工作,迤萨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发迤萨镇党委 2005 年 143 号文件,组成了以镇党委书记为课题调研协调小组组长的镇领导协调小组,成员包括了课题涉及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街道社区主任六人。

#### 以各级地方侨联侨办为科研课题的协调中心

为搞好“红河县侨乡文化课题研究”调查工作,保证课题按质、按量、按时完成,领导小组在具体运作上,以各级地方侨联侨办为科研课题的协调中心,组成了课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为祝金荣(红河县侨办科长),副主任为张尧邦(红河县侨联主席)、屈燕林(红河学院红流中心),具体协调红河县各相关单位的资料收集、迤萨镇及街道社区的采访对象的安排等具体事务。

#### 以当地文化人为科研课题的支持力量

为搞好“红河县侨乡文化课题研究”资料收集、调查工作,我们坚持以课题组成员为核心,以当地文化人为科研课题的支持力量,充分整合高校与地方的研究人员。课题组在红河县一个月的调研期间,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听取黄世荣、钱存广、李建龙、邵泽祖、李信忠、白永朝等十余位地方文化人介绍当地侨乡文化、华人华侨侨眷代表人物、资料情况、对课题的意见建议等,使课题组在最快的时间内掌握了调研的现状、人物、资料等具体情况。以当地马帮赶马老人及其遗孀为科研课题的重点访谈对象

当地马帮赶马老人及其遗孀是红河县(迤萨镇)侨乡文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由于政治运动、时间和身体健康等原因,建国以前的马帮赶马老人及其遗孀在世的人已为数不多,课题组坚持以当地马帮赶马老人及其遗孀为科研课题的重点访谈对象。在红河县一个月的调研期间,课题组对当地马帮赶马老人及其遗孀进行了一百余次的采访,收集了他们或其亲属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关于研究经费的筹措——以高校科研课题经费为主的多方筹资投入机制。

在课题的视角、方法、组织保证等确定后,经费就是课题能否进行和顺利完成的能源和动力,为此,课题组广开渠道,多方筹措经费,具体有:

#### 高校科研课题经费为主的筹资

红河学院由专科升为本科、由单一师范院校变为综合院校后,科研成果和水平成为衡量其办学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学校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在红河学院重视科研的大环境下,课题组主要筹备人员通过与校领导的多次交流、沟通,取得了红河学院领